

doi:10.19697/j.cnki.1673-4432.201802011

《逃离魔法师》的女性主义解读

郭 巍^{1,2}

(1.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 通过考察《逃离魔法师》中女性在教育、职业生涯和两性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不平等以及男性阴影下的女性间的友谊, 发现二战后父权制传统下的女性仍是由男性定义的他者, 力争平等自由的主体地位的女性难以摆脱在男性的魔咒下矛盾挣扎的命运, 性别藩篱下的女性友谊也难以升华为真正的友谊。《逃离魔法师》反映了二战后英国各阶层的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真实处境与生存状态, 揭示了默多克思想脉络里潜藏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 《逃离魔法师》; 女性主义; 艾丽丝·默多克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4432(2018)02-0066-06

艾丽丝·默多克是英国战后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和哲学家,《逃离魔法师》是默多克于1956年发表的一部充溢着“魔幻与神话”色彩的作品。批评家Byatt在《自由的程度》一书中认为,“小说探讨的不是人物从何种程度上获得自由而是人物从何种程度上受到奴役”^{[1]42}。Sullivan对小说中的恶做了地形图式的解读,并认为默多克小说中的“巫师和恶魔要从心理、社会和神话的层面”来解读^{[2]73}。Conradi则指出,《逃离魔法师》中的核心人物米沙·福克斯和她之后创作的多部小说中的男性魔法师人物都是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埃利亚斯·卡内蒂“变形后的再现”^[3]。国内最早评论该小说的文章《〈逃离巫师〉与〈离开麦肯基先生后〉中的女性人物》将两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进行了简要对比。国内学者阮炜认为,《逃离魔法师》中的“重要人物将在默多克创造的许多人物身上‘转世’,许多重要场景经改头换面,也将在她以后发表的小说中复出”^[4]。另一位学者何伟文则把小说的人物分为三个层面来诠释小说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对《逃离魔法师》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男主人公关注居多,对女性人物以及作品中渗透的女性主义意识关注过少,这与早期研究多倾向于从默多克自身的道德哲学体系出发有关,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默多克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和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本文从社会总体环境、两性关系、同性友谊的角度,以小说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在二战后英国的生存状态分析入手解读作品中渗透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女性是由男性定义的他者

女性受奴役的历史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而悠久。女性一直被男性所定义,她们的声音一直被男性所压制,以至于连她们也认为自己是附属于男性的他者,依附性已经深入她们的骨髓以至于她们都不知道自我和主体性为何物。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描述女性的地位,“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

收稿日期: 2017-12-20

修回日期: 2018-01-29

作者简介: 郭巍(1982-),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Email: letitiagu@126.com。

引文格式: 郭巍.《逃离魔法师》的女性主义解读[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18, 26(2): 66-71.

Citation: GUO W. A feminist reading of Iris Murdoch's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8, 26(1): 66-71. (in Chinese)



(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5]11}虽然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很多女性开始拥有自己的职业,社会中固有的两性关系模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但是社会中由历史沿袭下来的男权制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在教育、公共领域和两性关系中仍难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逃离魔法师》故事的开始,女主人公安妮特·科考恩正在肯辛顿一所昂贵的社交教育学校“伦敦豪女子学院”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初入社交领域的上层社会年轻女子如何在一个,最多两个社交季找到丈夫的手段”的学校。女性在这种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帮助她们接受社会赋予她们的既定角色,无疑使她们缺乏主动精神。安妮特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他无疑受到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孩的教育不如男孩来得重要。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安妮特的哥哥尼古拉斯送去上公立学校,而认为“安妮特的教育不是那么重要”^{[6]8},他期望着社交教育学校可以把安妮特从一个“四海为家的褴褛女”塑造成“一位真正真正的英国淑女”,从而可以在伦敦的社交圈成功亮相。安妮特的妈妈表示赞成这项安排,“即使她有什么异议,也不会表达出来”^{[6]8}。显而易见,在安妮特的家中,女性是没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的,抑或是即使她们表达了看法,也未必会有人重视或采纳。安妮特的哥哥继承了父亲对待女性的态度,对妹妹安妮特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爱护。他在安妮特十七岁的时候就安排他的朋友夺走了妹妹的童贞,并向安妮特灌输“你对待这些事情一定要理智,妹妹,不要对此有所期盼,更不要被其神秘感所迷惑,这样只会让你更神经质。”^{[6]59}安妮特哥哥对她灌输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她不能积极正确地认识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7]。

小说中的女性不光在家庭和教育领域难以和男性实现真正的平等,在公共领域中,努力向上能力超群的女性也会触怒周围的男性。“在各个职业领域,男性本能地认为女性应该靠边站。”^[8]小说中的凯斯门特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凯斯门特小姐和约翰·伯伦拉尔夫同在欧洲劳工移民特别委员会(SELIB)工作,约翰担任主要职位,是凯斯门特小姐的顶头上司,凯斯门特小姐开始的时候是约翰的私人助理,后由于工作业绩出色而屡得提升。约翰一方面受到凯斯门特小姐所散发出来的女性气质的吸引,凯斯门特小姐总是“把她的裙子撩得很高,整个大腿都露了出来,还隐隐约约能看到内衣”^{[6]90},一方面又对权力转向办公室中像凯斯门特小姐这样的女冒险家们的手中感到深深的忧虑与不安。说到底,女性的进取使男性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约翰和另一位男同事埃文斯同为该部门的领导,终日无所事事,在一次聊天中,埃文斯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些女人和她们的朋友就可以运作整个办公室了。”^{[6]88}约翰没有对这种社会变化持认同和接受的态度,他感到“这些一心渴望职场升迁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女性忘记了古老法则,就是大学毕业生、男性或者从行政职位调派来的人员的天然优越性。”^{[6]89}凯斯门特小姐写了一份关于欧洲劳工移民委员会的重组报告令约翰自愧不如,约翰承认这是一份翔实而出色的报告,但是又清楚如果提交这份报告就会触犯很多其他部门的利益从而使自己深陷困境,因此他决定“将凯斯门特小姐的报告束之高阁”^{[6]120}。凯斯门特小姐最终还是越过上司约翰巧妙地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上级部门,约翰得知后大为恼火,他觉得自己作为上级的权力和作为男性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后来凯斯门特小姐通过不断示好和邀请约翰同去参加米沙·福克斯的宴会,两人才实现了和解。通过凯斯门特小姐,默多克显然想要说明女人在能力和智商上丝毫不输给男性^[9]。

女性最为沉重的奴役表现在小说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消极的界定。这一点从约翰与米沙的交谈中可以得到证实。当米沙问约翰为何看起来疲惫不堪的时候,约翰回答道都是女人惹的祸。“她们玷污了一切,使待在办公室的时间难以忍受,现在她们又追到他的家里来。”^{[6]132}约翰一方面在同性面前指责着女性,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对女性施加性暴力。实际上就在米沙来之前,他正在对安妮特进行性攻击。他大概“想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主体地位”^{[5]406}。约翰感觉他需要向米沙吐露他对女人的看法,他接着抱怨女人们把工作中的活都抢走了,她们让他觉得自己待在办公室毫无意义。米沙马上点头表示赞同,并说道“很多女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形式。她们就像是生理实验中的胚胎,在任何位置都可能长出任何器官。把腿放在眼睛的位置,它就长成了眼睛,而眼睛也会长成腿。最好的情况是

她们没有外形,最坏的情况是怪物”^{[6]133}。米沙对女性的认识明显带有对女性贬损的倾向。他继而把女人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独角兽女孩,也就是指“充满幻想的年轻女孩”,她们认为“自己的美德可以征服一切”;第二类是女妖型女人,她们是“毁灭型女人”,对于这种女人“你只能伤害她,而她会毒死你”;第三类女人是“智慧女人”,对于这类女人“所有的结构都要被摧毁”,然后“可以通过摧毁她之后再创造出一个女人”。^{[6]134}米沙把女人完全物化,而不是把她们当成可以平等对待的人。女人对于米沙来说不是爱的对象,而是他实现征服掌控权力的一种方式。他对待女人的看法也反映在他与小说中几位女性人物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缺乏默多克所定义的爱与自由,“爱就是尊重,就是关注和忘我,让他物存在”^[10],而更多地呈现的是主人和奴隶、奴役与被奴役、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女性对于米沙来说就是“探索他自己的他者”,他对待周围的女性的态度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想要在他人身上施加形式的强烈控制欲,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当做物、抽象概念或象征物一样对待,而不是将他们当成值得给予充满爱意的关注的独特个体”^{[2]86}。

二、女性是挣扎于男性魔咒下的矛盾体

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总是在男性的魔咒下亦步亦趋,小说中男性的魔咒看似散发自道德之恶,实则源自男性的主体地位。面对着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她们既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又成为向其挑战的力量,她们局限于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所包围,她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安宁。她们的温顺永远伴随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永远伴随着接受。”^[11]这种矛盾明显地呈现在小说的三位女主人公身上。

安妮特·科考恩是耽于幻想的“天真少女”。她痛恨教授礼仪和塑造淑女的伦根豪女子学院,决定逃离学校进入“人生的课堂”自我教育。安妮特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拒绝“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成为一名只待嫁人的伦敦淑女,然而“她自身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于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5]406}在她踏入人生课堂的那一刻,她似乎是“穿过了魔镜。她意识到她自由了”^{[6]9},从此她进入了一个她臆想中更“自由”的世界。默多克认为爱让心灵从幻想中解放出来,作为人类目标的自由应该是脱离幻想的自由^[12]。安妮特由于缺乏父母和周围人的关爱,因此她对自由和现实的理解带有幻想的色彩。她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一切无所畏惧,更不知恶为何物,很快在遭遇男性的时候便成为了满足他们欲望的猎物,面对他们对她的性攻击和暴力,她不是作为主体积极地反抗,而是消极而顺从地接受。

安妮特人生课堂的第一课是遭遇约翰·伦伯拉尔夫的性攻击。奇怪的是,安妮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反抗,后来由于约翰的言辞激怒了她,才开始挣扎。安妮特矛盾的行为代表着女性“分裂的人格”,“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5]206}。这时,米沙·福克斯登门拜访,慌乱中约翰将安妮特囚禁在橱柜里,直到米沙离开才将其释放出来。约翰还为自己粗暴的行为做了荒谬的辩护,“我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伤害或惊吓到别人,而我们的本意是好的”^{[6]189},安妮特在面对约翰的暴力行为时明显表现出了作为客体的被动性,这大概和他哥哥向她灌输的不要对性行为抱有神秘的幻想的思想不无关系。安妮特人生的第二课是来自让·卢西维奇的性骚扰。让·卢西维奇是罗莎的情人,一次在拜访罗莎的时候遇到了漂亮的安妮特并与她攀谈,还肆无忌惮地在安妮特的房中对她动手动脚,安妮特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呼救,直到罗莎闯入她的房间才使让的骚扰行为终止。安妮特在遭受米沙拒绝绝望之际想把所有珠宝抛入水中的时候,让再次出现,强行夺走了安妮特的珠宝并对她施以威胁。安妮特面对男性的暴力表现出了女性的柔弱与无助。她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

如果说安妮特在两性关系中受到的主要是身体方面的压迫,那么尼娜在两性关系中受到的压迫则主要来自精神层面。尼娜是来自东欧的难民,她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名无姓的女性人物,她被称为裁缝尼娜,“有耐心,性情温和,谦卑,小心谨慎”,她是一名手巧的裁缝,做出的衣服极富想象力。她努力想忘却或遮掩自己作为移民的身份。为了积极地融入伦敦的生活,她把原本乌黑的秀发染成了金

黄色,与人交流的时候坚持使用英语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她给人的印象是她是一只人造的小动物”^{[6]76}。她在遇到米沙·福克斯的那一刻,就无可抗拒地沦为了他的“奴隶”,成为“他手中掌控的众多生物之一”。作为女性和难民的身份使尼娜受到双重奴役,心甘情愿地受控于米沙并顺从地接受米沙对她的定位。在尼娜的眼中,“米沙代表着权威,他身上散发着异国风情的魅力和一种东方的魔力”^{[6]140}。连她自己都难以界定她和米沙的关系,她开始的时候曾热烈地爱过他,但米沙剥夺了她表达爱的权力。米沙把尼娜安置在切尔西街上的一个房间里,并每月给她提供经济来源。米沙对尼娜的帮助更多地是出于对她的怜悯而不是发于爱,在默多克看来怜悯像残忍一样是对爱的嘲讽,因为它否定了他人的偶然性以及独立存在的尊严。^{[2]82}当尼娜在米沙面前表示她想扩大自己的裁缝事业的时候,米沙断然拒绝了,随后增加了给尼娜的月供。伍尔夫和波伏娃都认为物质上的独立是赢得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上受控于米沙使得尼娜精神上也无法自由,米沙“剥夺了尼娜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也“使她不可能向任何人敞开心扉”^{[6]143}。尼娜对米沙的爱慢慢变为对他的恐惧和愤怒。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生活,决定逃离米沙的魔咒。与此同时,米沙帮助罗莎把卢西维奇兄弟驱逐出英国的行为也殃及到尼娜,因为他们同属于来自界线以东的难民,欧洲劳工移民特别委员会规定在界线以东出生的难民向英国移民是非法的。尼娜在担心被驱逐的恐惧中走上了自杀之路。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罗莎·凯普在两性关系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奴役,这位看似自由的人物身上充满了矛盾。罗莎是米沙·福克斯的旧日情人。故事开始之时,她放弃了之前的职业,在工厂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拜厄特认为罗莎处于这种信仰迷失的状态是因为她是自由传统的继承者,而这一传统在现存世界已不复存在。^{[1]51}罗莎“从不希望别人靠得太近”^{[6]45},似乎这种亲密的关系会威胁她的独立性,而她的独立很快就在遭遇男性的时候频频地陷入危机。罗莎在工厂遇到了来自波兰的难民卢西维奇兄弟让和斯蒂芬。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不通,两兄弟的孤独与沮丧激发了罗莎的保护欲,罗莎开始每天下班后到他们的住所与两人一起围坐在床架中的地板上教授他们英语。安妮特藏匿其中的橱柜和罗莎教授英语的场所似乎都是对女性身体进行囚禁的一种象征物。开始的时候两兄弟就像是罗莎的“奴隶”,处处依赖罗莎并将她奉若神灵,而罗莎本人却对突然拥有这种陌生的权力担忧多于欢喜。这种权力关系很快就发生了反转。语言的掌握和男性意识的复苏似乎赋予了他们新的能量与权力。他们由奴隶反转为主人,罗莎很快沦为他们共同享有的性伙伴。为了不失去两兄弟,罗莎选择了奉献肉体,麻木精神。在一种深深的不安中,罗莎感到了“现在权力离她而去。兄弟两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像以往一样温柔而尊敬地对待她,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是征服者的眼神”^{[6]56}。罗莎与卢西维奇兄弟之间的关系反映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论述的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波伏娃对此观点颇为认同。“每一个人都想把他人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5]164}两兄弟开始更变本加厉地折磨罗莎,罗莎被迫求助于她的旧日情人米沙。多年前“米沙身上的恶曾摧毁罗莎使她最终不得不逃离”^{[6]242},多年后向米沙求助使罗莎觉得“自己迈向了囚禁”^{[6]241}。对罗莎来说,米沙身上的恶就是对她精神的控制,使她在其男性权威下变成“他游戏的一颗棋子”,无法自主地选择、自由地存在。他对待罗莎的爱缺乏波伏娃所说的相互性。米沙通过帮助罗莎驱逐卢西维奇兄弟使罗莎重回他的控制。罗莎鬼使神差地奔赴意大利拜访米沙的时候,凯尔文向罗莎吐露的两件事——他受米沙指使偷拍罗莎和卢西维奇兄弟以及尼娜的自杀——使罗莎彻底从对米沙的幻想中醒悟,她意识到她原以为“过去无论是走向米沙怀抱还是逃离他的控制都是根据他的意愿所为,但是一切都是幻象”^{[6]281},似乎也意识到由于自己极力想摆脱自身的困境而忽略了对周围的人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尼娜的求助所应负的责任。

三、女性间的友谊很难升华为真正的友谊

波伏娃认为女性的友谊和团结对女人来说十分珍贵,但女性友谊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

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5]64} 女性间的友谊很难升华为真正的友谊，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5]65}。她们以共同的体验而不是个性基础而建立的关系很容易产生敌意。尤其在爱情方面，每一个女人尤其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作敌人^{[5]616}，男性的阴影总是遮天蔽日地悬在她们头顶。女性间充满敌意和冷漠的情节出现在很多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大概也是因为此情节乃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在默多克的另一部小说《一只凋零的玫瑰》中，这种情节发展到了极致，女儿米兰达与母亲安同恋上一位男性，女儿米兰达用出轨的父亲还会归来的谎言阻止了母亲与这位男性的结合。在小说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中，秀拉因为勾引了朋友耐尔的丈夫而使两人多年的友谊破裂。在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中，残忍的姐姐因自己不能生育而纵容自己的老公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亲手毁掉了妹妹一生的幸福。同处性别藩篱的女性本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同盟的关系，但很多时候女性却由于嫉妒、自身的处境、阶层的隔阂或对他人缺乏关注，完全无视他人的求助或未能对他人的求助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酿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米沙是悬在罗莎和安妮特头上的阴影，两人原本还算融洽的关系因米沙而急剧恶化，多半是由于嫉妒而引发的敌意。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托瑞尔·莫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嫉妒心，原因在于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社会依赖。她同时指出嫉妒的女性总是把充满敌意的矛头瞄准对手而不是对准她们的爱人^[13]。罗莎和安妮特的母亲玛莎·科考恩曾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后来罗莎和安妮特同住在一间公寓，两人的关系虽算不上亲密，但也十分融洽。米沙举办的晚会同时邀请了两人。安妮特突然被米沙迷得神魂颠倒，一心期望得到他的关注，在与他跳舞的时候，顺势倒入他的怀中。而另一边，汉特担心凯尔文将罗莎与卢西维奇兄弟的照片给约翰看，急忙向罗莎求助让她想办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罗莎顺手把她手中的镇纸抛了出去，砸在了鱼缸上面，瞬间引起了现场的一片混乱。安妮特却误以为罗莎是故意为之以使她和米沙跳不成舞，因此“像一只小老虎”一样扑向了罗莎。两人扭打起来。“那时罗莎觉得她可以杀了安妮特，或像撕毁一只玩偶一样把她撕掉。”^{[6]197} 当安妮特回到家中，罗莎看到她穿着米沙的衣服，猜测他们曾待在一起，因而醋意大发，把安妮特的衣服一股脑倒在了台阶上，而疲倦的安妮特因为踩到衣服上打滑而滑下了楼梯摔断了腿。伤心的安妮特躲到了约翰的家中，后来又在旅馆之间辗转反复。米沙的拒绝加上罗莎的敌意使安妮特对人生心灰意冷，上演了自杀的闹剧。好在安妮特最后性命无忧，和父母乘着火车重返“科考恩之地”。而裁缝尼娜却没有那么幸运。

尼娜和罗莎相识是因为裁缝生意的关系。尼娜曾耳闻罗莎与米沙之前的爱恋关系，而且猜测罗莎也听到过她依附米沙而生活的传闻。“罗莎曾经受到米沙魔咒的吸引，却没有移居他国就成功地逃离，这一点使尼娜对罗莎佩服之至。”^{[6]145} 这也是尼娜后来在准备逃离米沙的控制到澳大利亚过自由的生活的时候求助罗莎的主要原因，但尼娜三次向罗莎求助都未得到她的回应，可以说和罗莎本人正处于无法挣脱的困境有关系，也与罗莎对尼娜缺乏公正而充满爱意的关注有关。默多克认为一个积极的道德主体的显著特征是对个体现实的公正而充满爱意的关注，这种关注会打破我们心理现实所建立的认识这个世界的假象。受幻象驱使的罗莎在米沙的魔咒下亦步亦趋地远离他或靠近他，周围的其他人根本不在她关注的范围内。尼娜在她眼中只是一个裁缝，而不是一个可能和她一样试图挣脱困境实现自由的女人。尼娜第一次向罗莎求助，罗莎因发现让出现在家中并对安妮特动手动脚而沉浸于自身的痛苦之中，完全把拜访者尼娜忘在脑后。尼娜第二次求助，罗莎正因无法摆脱斯蒂芬而要向米沙求助，当尼娜知道罗莎正去往米沙家的路上，她只能再次转身离开。尼娜第三次求助的时候，罗莎的弟弟汉特因为受到斯蒂芬的威胁精神陷于极度恐惧而进入昏迷状态，罗莎无暇顾及及其他，罗莎再次忽略了尼娜的求助。求助无果的尼娜绝望地走上了窗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尼娜的自杀虽多半由于她出生地的原因，但罗莎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莎的只言片语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挽回尼娜的生命，就如卡尔文所说，“尼娜除了填几份表格什么事也不会有。本该有个人向她解释这一切。”^{[6]279}

四、结语

默多克在《逃离魔法师》中塑造了多面多阶层的女性人物，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天真少女安妮

特, 又有没有国别身份的他者尼娜, 还有挣扎于顺从和逃离之间的中产阶级女性罗莎和职场上积极上进的凯斯门特小姐, 她们奋力挣扎着试图摆脱父权制的牢笼以及父权制传统赋予她们的性别定位, 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借此默多克向我们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强大钳制力量。透过这些人物的描写, 我们可以窥见默多克关注女性问题, 重视女性精神上的自主和道德上的独立, 并将女性的这种生存困境和矛盾挣扎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历史积淀。

[参考文献]

- [1] BYATT A S. Degrees of freedom: the early novels of Iris Murdoch [M]. London: Vintage, 1994.
- [2] SULLIVAN Z T. The demonic: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 [3] CONRADI P J. Holy fool and fagus: the uses of discipleship in *Under the Net* and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123.
- [4] 阮炜. 评《逃离巫师》[J]. 外国文学研究, 1995(2):75.
- [5]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6] MURDOCH I.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6.
- [7] XU M Y, SUI X D, AN X H.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female selfhood in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14(4):328.
- [8] PUGH M.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Britain 1914-1999 [M].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2000:286.
- [9] 黄源深. 《逃离巫师》与《离开麦肯基先生后》中的女性人物 [J]. 外国语, 1987(2):37.
- [10] SAGARE S B. An interview with Iris Murdoch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1(47):703.
- [11] 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 [M]. 李强, 选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4:231.
- [12] MURDOCH I.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1:65.
- [13] MOI T. Jealousy and sexual difference [J]. Feminist Review, 1982(11):61.

A Feminist Reading of Iris Murdoch's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GUO Wei^{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Englis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nowned English novelist Iris Murdoch refused to be labelled as a feminist writer, her early novel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is imbued with th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obliquely reflecting the true situations and the existential status quo of the British women from different classes who still subordinated to men in a male-centred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used by Simone de Beauvoir in *The Second Sex*, coupled with Iris Murdoch's conception of love, fantasy, freedom, attention will b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nequality encountered by women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career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female friendship under the male shadow.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at women were still the absolute Other defined by men under the tradition of the post-war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 who endeavor to gain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subject position were still doomed to struggle under the male enchantment, and the female friendship shrouded by the sexist discrimination cannot sublimate into true friendship.

Key words: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feminism; Iris Murdoch

(责任编辑 李 宁)